

农村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讲话

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

NONGCUNSHE
HUIZHUYISI
XIANGJIAO
YUJIANGHUA

南人民出版社



农村社会 主义思想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会好读书

思政教育

新教育

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

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讲话

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

责任编辑：彭富强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198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.5

字数：73000 印数：1—30000

ISBN7-217-00692-9

D·90 定价：1.25 元

说 明

中共湖南省委最近决定：在农村开展一次深入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。省委领导同志指示由省委宣传部编写一个宣讲大纲。为此，我们根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、五中全会精神和江泽民同志的国庆讲话，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文件精神，针对当前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，围绕如何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主题，编写了这个《讲话》。在农村基层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时，本书可供下乡干部、农村基层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学习和宣讲用。

本书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思平同志主编，刘思平、罗志丹同志统稿。参加编写的有尹平生、成建保、李湘舟、朱三平、胡弥华、赵文彬等同志。由于时间仓促，水平有限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八九年十一月

目 录

第一讲	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	(1)
第二讲	继续深化农村改革，执行稳定的农村政策	(27)
第三讲	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的精神 …	(45)
第四讲	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	(60)
第五讲	用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武装头脑，做新型农民	(70)
第六讲	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，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	(84)

第一讲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

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已经建立 40 周年了。40 年来，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过去受人宰割的贫弱之邦，今天已经成为初步繁荣富强的主权国家；昔日受尽欺凌的“东亚病夫”，如今已经成为具有崇高国际威望的东方巨人。中华民族奋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对此，我们广大的农民群众感受最深。

一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救中国农民

在旧中国，我们农民是受压迫最深的。头上压着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，颈上套着政权、族权、神权三根绞索，再加上水灾、旱灾、蝗灾、瘟疫、战乱，我们无时无刻不是处于痛苦的深渊。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赶走了洋强盗，打垮了反动派，建立了新中国，并把我们领上了社会主义道路，我们才跳出苦海，见了天日。

（一）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。

旧社会到过上海的人都记得，那时，黄浦公园门口有一块牌子，写着“华人与狗不准入内”。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外国佬竟然公开将中国人与狗并列，不准进入中国人自己的公

园，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！

曾以灿烂的科学文化、繁荣的社会经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文明古国，为什么会衰败到如此程度？归根结底，是因为旧中国社会制度腐朽。

中国自春秋时代进入封建社会，到 1911 年清朝灭亡，漫漫 2000 多年，一直处在封建制度统治之下。北宋以前，中国的经济、文化，在世界上一直遥遥领先；但南宋以后，随着封建制度日趋腐朽，中国便越来越落后了。特别是到了清朝，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腐朽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，不惜采取残酷手段扼杀一切要求进步、发展的力量，因而使得中国走向衰落。而当时法、德、英、美等西方国家，却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，推翻了封建制度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，从而迅速发展强大起来，短短一百年，就创造了比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下几千年还高得多的社会生产力。它们看中了衰败的中国面积广大、人口众多、资源丰富，是掠夺原料、倾销商品的巨大市场，于是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。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晚清统治集团被帝国主义的大炮吓昏了头，企图以妥协投降、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侵略者的怜悯，削弱了统治阶级内部以林则徐为首的主战派势力，镇压了沿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，与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。第一个不平等条约“南京条约”，就向英国赔款 2100 万元，把香港割让给英国。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占去了 15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，相当于七个半湖南的面积！

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都侵略了中国，中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，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！中国应该向何处

去？许多志士仁人，在漫漫长夜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从1851年金田村起义，到1864年的天京沦陷，1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农民，是寻找革命道路的伟大尝试。洪秀全等人提出了建立农村公社式的组织和消灭私有制的主张，但仅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。这次农民革命终被封建统治阶级联合帝国主义势力镇压下去了。1898年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想模仿西方，开议会，办实业，图富强，但这条道路也未走通。戊戌变法，“六君子”被杀，光绪皇帝被囚禁，康、梁被迫逃到日本，仅仅一百天就宣告失败。孙中山先生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，建立民主共和国，把西方资产阶级宪政的三权鼎立扩大为五权，在五权宪政治理下建立近代的工业化国家。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，但也没有找到真正解救中国的出路，其胜利果实却被“窃国大盗”袁世凯篡夺了。一些想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人，提倡“实业救国”、“科学救国”和“教育救国”，结果也只能是四处碰壁，一事无成。

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的确立，使黑暗的中国看到了希望的曙光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，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，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的前途：走俄国人的路，搞社会主义。党还指出，走这条路要分两步：第一步，动员全国人民起来革命，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，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；第二步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，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，终于完成

了第一步的革命任务，推翻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，把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光明的新中国。到1956年，又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，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。从此，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。到今天，我们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，发展了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各项事业，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力量，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。我们的国家，已经成为发展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强大力量。

历史从正反各个方面反复证明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。走社会主义道路，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选择。

（二）社会主义是中国农民唯一光明的前途。

有一首古诗这样写道：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成万颗籽。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。”这首诗，真实地反映了封建制度下农民深受地主阶级剥削的悲惨命运。那时，不到总人口10%的地主阶级，霸占了80%以上的土地。他们凭借土地私有权，残酷地剥削农民，敛聚了巨额财富。《红楼梦》描写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家族财富之巨是：“贾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；阿房宫、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；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；丰年好大‘雪’，珍珠如土金如铁。”这巨额的财富，没有哪一点不是农民的血汗！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，霸占了几个县的土地，方圆数千里的农民，全是受他剥削的佃户。他的收租院比地狱还黑暗：大秤、大斗、铁风车，农民将全部粮食送进去还交不满租谷，许多人家被逼得卖儿卖女、家破人亡。

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，农民除受地主阶级剥削

外，还要受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的剥削，更是雪上加霜。叶圣陶 1933 年写的《多收了三五斗》，就描写了一幅农民在三重剥削下丰收成灾、纷纷破产的惨景：那年，风调雨顺，没受虫灾，每亩粮食比往年多收了三五斗。农民们满以为粜了粮食交了租以后，还能买点洋油、洋火、洋肥皂，给老婆孩子扯几尺花洋布。谁知外国资本家向中国大量倾销洋米、洋面，米行资本家趁机狠刹农民的粮价，两个月前还是 13 块、15 块钱一担的白米，这时只剩 3 块。农民将白花花的大米一船一船送进米行，只换了少许几张“走水”的票子，连交租都不够。他们悲愤地问道：“我们年年种田，到底替谁种的？”交不满租、还不了高利贷、完不了苛捐杂税，还要坐牢。他们只好背井离乡，外出逃亡。这时，洋奴买办又与外国资本勾结起来，将破产的农民大批大批地拐卖到国外当苦力。许多人一去就永不复返，死在人贩子或外国资本家的皮鞭下，抛尸异国他乡。

旧社会的农民除了经济上的剥削外，还要无休止地为统治阶级服徭役、服兵役。旧中国几千年，战乱不停，无数农民被强迫入伍，“朝为耕种人，暮作刀枪鬼。相看父子血，共染城壕水”。千千万万个家庭，就只剩老少几代寡妇苦守孤灯，相依为命。战乱中，统治阶级还大肆屠杀无辜群众。朱元璋“屠湖广”，就在我们湖南、湖北制造了无数“无人村”。军阀混战、蒋介石“四·一二”政变以后和日寇侵华期间，更是杀人如麻。它们推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如野兽一般残害人民。

旧中国农民灾难深重，每当走投无路时就揭竿而起。但是，从秦末的陈胜、吴广到明末的李自成、张献忠起义，大

小上千次，从来没有成功过，其中不少还成了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。起义军拼死打倒旧皇帝，累累白骨却堆成了新皇帝的金銮宝殿；起义军拼死杀掉了一批贪官豪强，腔腔鲜血却酿成了另一批贪官豪强杯里的美酒黄汤。朝复一朝、代复一代，农民始终是受剥削、受压迫，从未见到过希望的曙光。

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，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农民的命运将更悲惨。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，要有一个资本原始积累过程，也就是要积累一笔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本钱。这笔本钱从哪里来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从殖民地和本国农民那里掠夺来的。当时的中国已经衰败，自己正在遭受外国帝国主义掠夺，哪还有什么力量去掠夺外国？这样，如进行资本原始积累，就只能纯粹是掠夺本国农民。我们知道，当年英国原始积累掠夺农民，采取的是“羊吃人”的“圈地运动”——新生的城市资产阶级，骑马到田野上去奔跑，奔跑一圈，圈内的土地就被他们霸占了。他们野蛮地将农民赶走，让良田变成草场，养羊来发展毛纺织工业。成千上万的农民，就这样顷刻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这时，资产阶级又制定专门法律，规定流浪汉必须进资本家的工厂做工，否则，第一次抓到要割掉耳朵，第二次抓到就要杀死。就是通过这样残酷的手段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起来了。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，当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90% 以上。但中国的农业却很落后，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巨额财富都被挥霍掉了，广大农民则是“二月卖新丝，五月卖新谷”，“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”，加上帝国主义的掠夺，整个农村经济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。在这种

情况下，如果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原始积累，必须要使绝大多数农民破产，成为流浪汉。而资本家的工厂绝不可能容纳这支庞大的流浪汉大军，充其量至多能吸收百分之二三十，那么，饿死的将是数以亿计。

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明确指出，中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，中国农民的前途也只能是社会主义。1926年5月，毛泽东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，为全国培养了3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。9月，他发表《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》一文，肯定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首要问题，指出如果没有农民在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，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就不会根本倒塌。北伐战争中，党中央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，由毛泽东任书记，领导全国农运。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，一个以“打土豪、分田地、一切权力归农会”为中心内容的农民运动猛烈地展开了。为了回击反动派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压制，支持正在迅速发展的农民运动，1927年1月，毛泽东回湖南进行了12天考察，于3月份发表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热烈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，痛斥了党内外一切怀疑和指责农民革命的谬论，强调只要党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政策，“很短的时间内，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、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，其势如暴风骤雨，迅猛异常，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。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，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。”“四·一二”蒋介石政变，革命失败了。“八七”会议，党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，决定将中国革命的重点放到农村，以武装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。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，回湖

南领导了秋收起义，创建了工农红军，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。经过五次反“围剿”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八年抗日，三年解放战争，终于赶走了侵略者、打垮了反动派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以后，又经过减租退押、清匪反霸、土地改革、合作化运动，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，获得了彻底解放。

事实证明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农民的光明前途。

二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农民获得幸福

俗话说：“人望幸福树望春。”但在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，我们农民只有当牛作马的份，从来不知道幸福生活是什么滋味。只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，几千年的愿望才逐步成为了现实。1988年，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15.35元，比1949年提高6倍多；人均消费额436元，比1949年提高7倍多；人均住房面积20.4平方米，解放前许多人家根本没有房屋。现在，几乎每个村都有几栋甚至几十栋红砖楼房。单车、手表、缝纫机“老三大件”已在农村基本普及，电风扇、电视机、收录机“新三大件”又大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。解放前，农民80%以上是文盲，合作化运动时，有高小文化的就被认为是知识分子；如今，中青年农民中初、高中毕业生占1/3以上。解放前，瘟疫一来，死人无数，天花、霍乱、痢疾、虐疾、鼠疫以及湖区的血吸虫，都能使成户成村的人死绝；如今，乡乡村村都有医疗卫生防疫机构，天花已经消灭，其它恶性传染病都得到有效控制，洞庭湖区50年代就治愈了75万血吸虫病人。事实充分证明，只有社会

主义，才能使我们获得幸福。

(一)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农民幸福的根本。

有一个区对家有万元以上存款的先富户中作过一次抽样调查，调查了 36 户，结果如下：

解放前，这 36 户除 1 户富裕中农外，其余 35 户都是贫下中农。36 户中有 11 户做长工的、3 户讨米的、22 户种租田的。36 户中除 8 户有一点祖上留下的破房外，其余 28 户都连挂笊篱的地方都没有。而今，这 36 户除了有房屋、耕畜、家具、农具外，还都有 1 万元以上的存款。如有一户猪皮加工专业户，解放前既无房屋，又无土地，几代都给地主当长工。现在，他家富了，土改分的土坯墙平房改建成了红砖水泥结构的两层楼房，有了手表、单车、电视机，手里还有 2 万多元存款。他说：“解放前，我们村共有 5 户地主，但无论吃、穿、住、行、用，都没有哪一户能和现在的我家相比。”

普通农家能有这样幸福的生活，不但旧中国几千年不可能，就是解放后的单干时期也不可能。只有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条件下，才能实现。

我们知道，在旧社会，我们农民所以累死累活干，但到头来总是没吃没穿的，就是因为土地被地主阶级霸占了，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被地主阶级剥削去了。所以，几千年中，我们农民都在做着“耕者有其田”的梦，做着“等贵贱，均贫富”的梦。1950 年到 1952 年，共产党领导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，全国 3 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 7 亿多亩耕地，广大农民真正乐了。许多人想，自己有了土地，就再也不会受剥削受压迫了，安心当个自耕农，生活马上会幸福起来的。

但他们想得太天真了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。其实，只要继续维持土地私有制不变，广大农民就终究摆脱不了受剥削的命运，就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。因为在单干条件下，各家各户经营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，顶多只能解决温饱问题，谁也不可能积聚什么经济实力。这样，一旦碰上天灾人祸，就无力度过难关，只能走卖田当屋的老路，从而重新失去土地。而另一部分条件较好的人家，不断买进土地，就逐步发展为新富农、新地主，重新成为剥削者。这样，农村就形成了新的两极分化，形成了新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。历史上，大规模农民起义摧毁旧王朝后，新王朝中的某些开明人物也采取过抑制豪强地主、给农民分配土地的措施，但每次用不了多久，土地又重新集中到了大地主的手里。50年代初土地改革后，全国和我们湖南就都出现过困难户出卖土地的情况。如果单干制度再延续五年、十年，就不知有多少人家会重新成为贫农、雇农。

正是这样，国民经济恢复以后，我们党立即引导农民开展了合作化运动。到 1956 年，全国 96% 的农户入了社、土地、耕畜、农具大都成为了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，大家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共同劳动，产品实行按劳分配，从而防止了新的两极分化发生，保障了全体农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。

当然，我们在实行集体化的过程中也有失误，那就是在高级社后期步子过快、过急，特别是不应该搞 1958 年的“人民公社化”，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水平的实际，造成了严重的平均主义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但是，这只是工作上的失误，集体化本身是完全正确的。没有集体化，就

决不可能有农民今天的幸福。

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之所以能防止两极分化，保障共同富裕，这是因为：第一，实行公有制后，千家万户分散的力量集合成了一个整体力量，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、农村交通和电力等基本建设，改善生产条件，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，从而避免了单干条件下部分农户破产的情况。第二，实行公有制后，土地不能私自买卖，条件好、收入高的农户可以不断改善物质文化生活，但不能买田置地，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产生新地主的路。第三，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后，在一个集体内，大家是团结协作、互相帮助的，有困难的农户可以得到集体的帮助，没有劳动能力的鳏寡孤独、老弱病残能得到集体的照顾或享受“五保”、“幼保”，使基本生活有保障，不致于沦为乞丐和流浪汉。

可见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，是我们农民获得幸福的根本。

（二）爱民兴农的政策是农民幸福的基础。

我们湖南虽自古被称为“鱼米之乡”，但是，旧中国湖南农业的基础却是很差的，生产条件恶劣，自然灾害频繁，生产水平很低。1949年，全省农业总产值仅15.84亿元，粮食总产量仅630多万吨。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，国家对加强农村建设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，使农业生产形势迅速好转。40年来，我省农业基本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，1988年，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303.01亿元，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4.5倍；粮食总产量达到2536.18万吨，比1949年增长3倍；棉花总产量4.39万吨，比1949年增长5.3倍；油料54.24万吨，比1949年增

长 6.5 倍；出栏肥猪 2813.7 万头，比 1949 年增长 13.8 倍；水产品产量 46.23 万吨，比 1949 年增长 9.7 倍。1953 年至 1988 年 36 年中，国营商业部门平均每年净调出省外粮食 60 万吨，生猪 79 万头。

正是由于生产的大幅度增长，才带来了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。而生产发展的基础，是社会主义爱民兴农政策打下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党始终把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题，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。1955 年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，毛泽东同志就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提出了按农、轻、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。以后虽然出现过反复和曲折，但总的来说，我们国家坚持了支农兴农的政策。有一个村支部书记和全村群众算过一笔“作田账”：解放前，我们给地主种租田。每亩最多收 500 斤谷，地主至少要两担半，还要交国民党政府的税，捐族上的款，加上保上、甲上的摊派，所以作田人年头到年尾累死累活，老是禾刀一上壁，家里就有饭吃。而地主、国民党政府、族长、保长、甲长等等，全是白拿白要，谁也不过问农民的生产。如今，我们给自己种责任田，国家帮我们修水利、筑公路、建电站，给我们提供化肥、农药、良种、农机，发放贷款、预购定金，进行技术指导，从而使粮食产量年年增，现在亩产高的达 2000 斤，低的也有 1600 斤，而合同定购粮亩平才 200 斤。这笔帐，就把社会主义的爱民兴农政策给算清爽了。其实，这还只是站在一个村的范围内算的小账，我们再来算笔大帐：50 年代以来，国家支持我们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至 1988 年，全省累计用于农业方面的投资